

# 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影響： 一個「霸權穩定論」演化的 分析觀點

宋學文\* 陳亮智\*\*

- 一、前言
- 二、美國因素與台灣民主：「霸權穩定論」之演化途徑
- 三、美國自由霸權與台灣民主
- 四、美國自由霸權的干預與台灣民主
- 五、結論

攸關台灣政治發展的外部力量－美國，其對台灣民主轉型之影響為何？美國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是無條件支持？或視情況而定？由於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國際事務之領導方式已由強調政治、軍事與經濟逐漸轉為除了政治、軍事與經濟外，亦著重民主、自由、平等之非物質因素以及多邊主義之精神，因此本文從「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角度出發，強調「美國自由霸權」與傳統霸權穩定論之差異，並就美國在海外的人道與民主干預行

---

\*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E-mail: hwsong@ccu.edu.tw

\*\*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isiache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0年12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年10月08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三期/頁1-51。

為，提出一個可以解釋並分析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角色分析的研究途徑。我們認為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態度基本上是同情並且支持的。但在後冷戰時期，一方面由於中國國力的上升，另一方面台海穩定與亞太安全逐漸成為美國對台政策之最核心考量，而這種考量則同時包含了政治、軍事、經濟與民主、自由之精神。這正是學界近年來之所以強調「美國自由霸權」，而非僅從傳統的「霸權穩定論」去解釋美國對外干預的原因，而這也呼應本文所持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觀點。

關鍵詞：台灣民主、台灣安全、霸權穩定論、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美國自由霸權、干預

## 一、前言

對許多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來說，美國可謂是最具影響與關鍵的國家，此乃為一般之通說。<sup>1</sup> 對台灣而言，「美國因素」非但影響了它的政治民主化，同時也深刻地左右了它的國家安全，乃至於它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政經關係。然而，攸關台灣政治發展的此一外部力量，究竟其本身對台灣民主轉型的作用與影響之邏輯為何？它又是如何既幫助且制約台灣的民主發展？本文擬從「霸權穩定論」之演化（*evolution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角度來探討「美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以及它對台灣國家安全的意涵。

回顧台灣的政治發展與民主化歷程，從冷戰時期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總統的威權統治時代，到後冷戰時期李登輝總統的民主轉型時代，再到 2000 年後民主深化與鞏固時代，華盛頓在每一個階段裡皆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sup>2</sup> 但是在這不同時代當中我們也發現，美國對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若干議題卻有著不一致的態度。整體而

- 
1. 一般來說，影響一個國家進行民主轉型的外部力量可區分為來自於國際組織（主要是歐洲聯盟）與國家（主要是美國）（Huntington, 1991:87-100; Burnell, 2005:361-384）。關於歐洲聯盟對民主轉型之影響的文獻可參照（Pevehouse, 2002: 519-529; Levitsky and Way, 2005:27-28）。關於美國對民主轉型之影響的文獻請參照（Muravchik, 1991; Cox et al., 2000）。在「美國因素」的影響上，David Adesnik 與 Michael Mcfaul 即認為，不論是民主或非民主政體，它們基於許多的理由而必須依賴美國，例如：統治權威的正當性、安全承諾、國際支持、經濟援助、武器供應，與軍事轉移等（Adesnik and Mcfaul, 2006: 7-26）。
  2. 本文主要是觀察、探討從 1986 年以來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態度與影響。事實上，台灣的民主發展並不始自於 1986 年或 1980 年代，而是在於此之前即開始（如發生於 1979 年的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而之所以選擇從 1986 年開始，是因為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於該年成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的成立並對原有之威權體制的執政黨構成執政上的威脅，甚或是有取代的可能，此為民主化或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從 1986 年或 1980 年代開始。

言，華盛頓對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民主運動是同情、支持並且鼓勵的；對民主化啟動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也是支持、鼓勵的（甚至以軍事手段來保護可能遭受中國大陸武力侵犯的台灣民主成果，譬如1996年的台海危機）。然而當民主化推動下的政治議題碰觸到台灣主權之爭議（如1993年開始提出的參與聯合國政策，1997年開始推動的參與世界衛生組織，1999年的特殊兩國論等）或是牽動到台灣獨立之可能的時候（2004年的公民投票與2008年的「入聯公投」），華盛頓的態度則轉趨保留，以致於採取不支持，甚至是反對的立場。對此，國內外學者或批評美國在全球推動民主政體的建立有其侷限性與雙重標準，或解釋美國的不一致態度乃是基於現實主義之國家利益觀點而犧牲民主價值以換得和平與穩定。他們或持學理分析或依現實政治觀察，亦提出一些不錯之研究（Schweller, 2000: 41-62；Hendrickson and Tucker, 2005: 12-21；林文程、林正義，2006：156；吳玉山，2002：7-26）。沿著這種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成果，本文以「霸權穩定論」之演化做為研究途徑，依循美國自由霸權的內在特質，以及美國在實踐其「巨型戰略」（grand strategy）時對台灣所做出的干預行為，提出一個結合霸權穩定論與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角色的研究分析。

所謂「霸權穩定論之演化途徑」（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係指一個分析視野乃是沿著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霸權國（美國）在國際政治中之扮演其領導角色是會隨著時空與人事物的變遷而有所轉變，從而實踐不同形式的「霸權領導」。由於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領導角色已經歷過多次的「演化」，而此「演化」的現象一方面反應了美國國家權力的興盛、衰弱與再起，另一方面也呈現了美國在不同時期對國際事

務之處理的不同思維與方式（宋學文，2004：172-174），因此透過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之領導角色演變的觀察，我們發現華盛頓對某單一議題的態度是深受其領導角色之演化的影響。詳言之，我們認為選擇從「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角度出發來理解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可以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第一、「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研究途徑首先立基於傳統的霸權穩定論，而該理論不但秉承了現實主義有關在單極體系下霸權國（美國）為維繫其「一超」之戰略優勢的國家權力分析，且亦吻合霸權國如何透過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來達成其國家利益的企圖（Keohane, 1984: 31-46），它是最適合用於解釋維繫霸權國利益的理論基礎。<sup>3</sup> 而從區域政經發展的角度來說，美國在東亞之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的存在不只是該區域和平穩定與軍事安全的重要支持力量，同時它也對該區域以及區域裡的國家之經濟發展、貿易流通、與科技躍升發揮了正面深遠的影響，而這些又是它們邁向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Rostow, 1986; Ikenberry, 2004: 354-358）。而在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上，當其民主發展之

---

3. 霸權穩定論在此一研究主題上的優勢涵蓋兩個面向：其一、霸權穩定的理論觀點與政策實踐是跨越了冷戰的結束，即不論是冷戰時期或後冷戰時期，美國霸權的存在都是維繫東亞區域和平的重要基礎。雖然在 1970 與 1980 年代美國國力與霸權有呈現下滑、式微的趨勢，但隨著冷戰的結束與單極體系的到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與影響依舊說明了它是世界唯一的超強。其二、霸權穩定的觀點與實踐是超越了傳統現實主義之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眼界，進而融合了權力平衡與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於有形或無形、正式或非正式、以及雙邊或多邊的國際建制安排當中（Ikenberry, 2004: 354-358）。顯見的是霸權穩定論超越了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實踐，進而兼具著它們兩者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精神落實。

結果可能受到區域強權(中國)的武力威脅時(如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以及該民主發展可能引發區域之和平穩定出現動盪時(如 2007-08 年的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公民投票)，美國會基於「霸權」角色的扮演以及在維持區域安全「穩定」的前提下，對台灣民主化所可能衍生的政治後果(如北京武力犯台)或正在進行的政治選擇(如加入聯合國公民投票)做相當程度地「介入」、「干預」或「管控」(前者以航空母艦戰鬥群之派遣，後者以外交反對辭令之表達)。<sup>4</sup> 美國的如此反應正說明了霸權存在的宗旨，並非針對任何一國的支持或節制，乃在維繫其國家之核心利益，以鞏固其霸權地位的持續。

第二、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在鞏固其霸權地位時，其戰略作法與傳統之霸權穩定論並非完全一致，它逐漸由強調軍事或政治的戰略轉為除了軍事、政治亦強調民主自由與人權保障，重視國際經濟貿易，並且努力實踐其所承諾、建立的國際多邊建制(Haggard and Simmons, 1987: 502; Ikenberry, 1999a: 23-28)。<sup>5</sup> 換言之，要解釋後冷戰時

---

4. 本文所指之「干預」並非軍事干預而已。事實上，美國在其領導角色的扮演上是會考量面對中國強大之國力與中國崛起之優勢，斟酌美國在兩岸關係之干預程度。

5. 後冷戰時期美國之全球戰略佈署之邏輯已由傳統式之「霸權觀」逐漸演化出帶有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之「自由霸權觀」。美國自由霸權有許多的特色，諸如：重視民主的價值與決策過程，強調多邊主義的合作與干預模式，以及追求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與國際「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之「全球治理」的實踐等(宋學文、黃子哲, 2002: 93)，而其中對自由、民主、與人權人道的重視與推廣可謂是美國自由霸權的重要特質，同時也是傳統美國外交政策裡極具重要性的一章(Muravchik,

期的「美國霸權」，我們已不能用傳統的霸權穩定論來解釋或分析，而必須由 John Ikenberry 等人所強調的「美國自由霸權」（American liberal hegemony）之相關理論來說明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是兼具著「現實主義」（強調美國國家利益）與「自由主義」（重視自由民主價值）的思維和策略以遂行其在國際事務上的巨型戰略與霸權穩定（Wang, 2003; Owen, 2006; Green and Twining, 2008），<sup>6</sup> 因為美國既是一個充滿自由主義與理想色彩的國際政治、軍事強權，也是一個講求務實、以現實利益為導向的理想主義國度。從此一角度來說，一個邁向民主，經歷民主轉型的台灣會是為美國所樂見的（基於美國擁有自由主義的國家特質）；但是當台灣民主化的結果可能引發區域的不穩定並且破壞國際和平時（可能是來自中國的軍事入侵，或是激起中國的軍事威脅），美國會基於穩定區域秩序的原則而務實地介入與干預，控管並防止雙方擴大衝突以致於走向戰爭（基於美國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這既呼應了美國的自由霸權，同時也印證了前述美國將區域的和平穩定視為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

第三、美國自由霸權的存在既以維繫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為最高目標，加以它既重視現實主義之國家利益，且強調自由主義之民主、人權、人道、平等、與經濟互惠等價值，

---

1991: 6-8, 17-18; Diamond, 1992: 28-31; Smith, 1994: 3-33; Brinkley, 1997: 117, 120-123; Peceny, 1999: 1-3; Monten, 2005: 113)。

6. 關於美國自由霸權的介紹，請參照 Ikenberry (1999a: 23-28)。

於是華盛頓在後冷戰時期逐漸發展出它對國際事務進行干涉的「新自由主義之干預模式」。<sup>7</sup> 在歷經 1990 年代對東帝汶、科索沃、波士尼亞、與盧安達等國的人權、人道干預之後，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更基於反恐戰爭的進行而強力推動海外民主政體的建立。就此發展而言，除了 Ikenberry 之外，美國不少學者如 Joseph Nye, Jr. 與 Robert Keohane 等人亦強調，美國若要使其「霸權國」得以持續與鞏固，則美國必須在傳統霸權國之核心元素（政治外交、國防軍事及經濟）外，融入更多的「軟權力」（soft power），如民主、人權及自由之精神，並且在國際事務之運作機制方面，亦需在傳統之雙邊主義外，推動更廣泛的多邊主義，如此才能促使霸權國的優勢得以延續（Ikenberry, 2002: 213-238; Nye, 2002; Keohane, 1984; 陳欣之，2006：128-134）。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篇論文發展如下：首先，我們從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角度出發去解釋美國在冷戰前後的東亞巨型戰略，並且說明維繫、穩固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乃是美國對此國際秩序的基本態度；和平穩定既是民主發展的基礎也是前提條件，同時也是美國介入、干預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理由。其次，從美國現實主義之自由霸權的特質來說明華盛頓之所以藉由其力量的展現而達到它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實踐，以及他對台灣民主發展「既採現實主義也採自由主義」之邏輯。再其次，我們從美國的干預行為探究華盛頓如何

---

7. 所謂「新自由主義干預」，乃是不同於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干預」，係指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干預行為巧妙地結合「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等精神與「現實主義」所注重的國家利益（Merry, 1999: 26-27）。

影響國際民主、人權與人道的落實，以及它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方式。最後，本文歸結：就算美國對台灣之外交政策是基於戰略、軍事與安全的現實利益，美國還是會傾向於以「支持台灣之民主政治」或「支持台灣之民主政體」為「口號」或「理由」來「正當化」（legitimate or justify）美國對台灣與兩岸關係的干預行為。

## 二、美國因素與台灣民主： 「霸權穩定論」之演化途徑

如前所述，台灣的民主政治是在美國基於霸權角色的扮演以及在維持區域穩定的前提下所進行、發展。但是關於美國的霸權角色以及它在國際事務上的領導風格，其本身則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的「演化」，而這也反映在本文所謂「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觀點。

### （一）「霸權穩定論」之演化

#### 1. 國際經濟的霸權穩定論

「霸權穩定論」最早乃是在 1970 年代由美國的政治經濟學家 Charles P. Kindleberger 所提出。而當初理論所揭櫫的是霸權存在對國際金融、貿易與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而非強調霸權存在對國際或區域軍事安全的貢獻（但後來霸權穩定理論則演化成強調霸權對兩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Kindleberger, 1973; Kindleberger, 1981; Krasner, 1976; Gilpin, 1987; 宋學文、黃子哲, 2002）。有關霸權穩定論研究的初期是嘗試去回應一個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裡的核心問題—即如何穩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並

協助戰後的經濟重建與發展？支持霸權穩定論的學者認為國際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需要一個「穩定者」（*stabilizer*）提供國際經貿與金融之安全環境，例如：交易的市場、穩定的資金、流通的貨幣體系，並且某種程度地管理貨幣兌換利率，以及協調國家內部的貨幣政策等（*Kindleberger, 1981: 247*）。*Kindleberger* 認為應該由單一強國霸權來主導、提供上述之條件是最有利於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穩定、與發展。他認為霸權的定位是去除「宰制」（*dominance*）的元素進而強調其「領導」（*leadership*）的特質。做為國際經濟秩序的領導者來說，一方面，霸權是有能力（*capacity*）對其他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服務，包括各種國際制度、建制的設立、規範、管理與維繫，以及各國之間的溝通、協調與談判等，同時也包括提供開放的國際貿易市場、充足的資金援助流通、以及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等；另一方面，霸權國必須有意願（*will*）也同時有責任（*responsibility*）來協助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與發展，而不是以唯利是圖的心態去掠奪（*exploitation*）其他國家或世界的資源而豐厚自己（*Kindleberger, 1981: 242-245*）。

何以霸權國願意如此扮演此一角色？本文認為：其一，從市場交易理論來說，霸權國之所以向國際社會提供集體公共財的服務乃是因為霸權國會是霸權穩定體系中最主要的受惠者（*Haggard and Simmons, 1987: 502-503*）。其二、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一方面在全球各地之政治、軍事與經濟皆涉入極深，美國與各國之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接著來臨，美國為了防堵共產主義之擴張亟需有一個自由開放與穩定健全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做為基礎，因此由美國所領導的穩定之「國際經濟秩序」會是和平之「國際政治與安全秩序」的重要基石（*Ikenberry, 2001:*

172-173)。<sup>8</sup> 而這樣的思維也為後期之霸權穩定論提供了理論發展之重要依據。

## 2. 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霸權穩定論

1970 年代末期霸權穩定論開始被運用在解釋霸權國對國際政治與安全的影響與貢獻。Robert Gilpin 即認為國際間的安全與秩序是必須依靠一個強而有力的霸權國來支撐與維繫；而也唯有霸權國具有這樣的實力，以及扮演一個國際領導者的意願，來向國際社會提供安全與穩定的條件（Gilpin, 1981; Gilpin, 1987）。透過霸權對國際政治秩序與軍事安全做出制度的安排，以及公共財的提供，世界與區域的安全、和平、與穩定將獲得維繫與鞏固。其運作之邏輯與機制為：一方面因為霸權在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上具有明顯的優勢，以致於區域內的強權國家或敵對國家不敢輕易地向霸權做出侵犯、挑戰；另一方面因為透過多邊（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雙邊（如：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之軍事安全體制的建立，霸權可以選擇藉由與其盟邦或戰略伙伴之間的合作，進而透過國際組織、國際建制與規範等以維繫、鞏固全球或區域的和平穩定（Keohane, 1984: 135-181; Gilpin, 1987: 72-80; Ikenberry, 2004: 354-358）。與「國際經濟的霸權穩定論」相似的邏輯，Gilpin 亦認為霸權之所以有意識地提供公共財以維持國際體系的安全、和平、

---

8. 然而究竟是「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造就了「穩定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亦或是「穩定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成就了「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這是有所爭辯的兩個命題。與前述論點相較，Ikenberry 自己與 Robert Gilpin 卻又認為，由美國所建立起的安全秩序對一個開放全球與區域之經濟是非常重要的；諸多東亞國家（日本、南韓、與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奇蹟是受惠於美國軍事保護、財力支助（美援）、以及市場提供等等（Gilpin, 2000: 52-87; Ikenberry, 2004: 356-357）。

與穩定乃是基於霸權國家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因為這樣外在國際環境的創造，非但使其同盟或戰略伙伴成為穩定秩序的受益者，同時也讓霸權自己成為最大的受惠者（Gilpin, 1987）。

### 3. 強調民主自由與多邊主義之「美國自由霸權」

到了後冷戰時期，不少學者認為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強應該更加強調、發揮它在民主、人權與自由等價值方面，注重其「領導權」與「軟實力」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並且在「多邊主義」的功能上多所著墨，以符合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如此呈現的美國自由霸權觀一方面不同於只專注在物質條件上（經濟、政治與安全）的傳統霸權穩定論，另一方面也迥異於歷史過往的其他強權，而是既重視美國在「現實主義」方面的一般國家性格（注重國家利益），也強調美國在「自由主義」方面的特殊性格（重視非物質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之價值）。美國自由霸權論認為，由於美國內在的民主體制，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且強調民主的決策過程，加以它外在對自我權力的設限，對國際組織與建制的推動，以及基於自由民主與人道人權的普世價值而發動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干預，這些都將塑造國際關係的新秩序，提供國際秩序發展一個穩定與安全的環境，並且讓美國的領導地位與國家利益得以獲得延續（Ikenberry, 2001; Nye, 2002）（關於美國自由霸權的介紹以及它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請參照本文第三節）。

## （二）從霸權穩定論分析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

不論是從霸權穩定論的名稱看來，或是從它的內容而定，我們可以歸結出：霸權國的存在與付出對國際經濟與安全的穩定、發展

是十分的重要；而維持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穩定（包括國際經貿與軍事安全）也是霸權國能否持續其霸權之最核心命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全球或區域秩序，包括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即充分反映出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對東亞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安全來說，戰後美國霸權的存在與駐留即是該區域過去沒有出現如同兩次世界大戰之大規模動盪與失序的關鍵因素（Armitage and Nye, 2007: 1-3; Chu, 2003: 127-163）。在對台灣民主發展的作用上，美國對台灣威權政府的施壓則若干程度導致了威權政體的弱化與鬆綁（政治面向）（Rigger, 2005）；美國霸權之下所創造之和平、穩定的台灣海峽則提供了台灣民主轉型一個相對安穩的外部環境（安全面向）（Adesnik and Mcfaul, 2006）；而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則相當程度促成了台灣依循現代化理論所揭櫫的「由經濟發展而邁向政治民主」的發展模式（經濟面向）（Rostow, 1986; Ikenberry, 2004: 354-358）。而基於霸權穩定的存在與持續，對於中國在台灣民主進展上的軍事恫嚇，以及對台灣民主發展所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脅，美國都適時、現實主義地（realistically）予以回應和干預。

#### 1. 美國霸權穩定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面向

對台灣的民主發展而言，一個由霸權國（美國）所主導的和平外部環境（東亞與台灣海峽）是有助於台灣建立起穩定的國內秩序，而穩定的國內秩序則有利於民主政治的萌芽。美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東亞和平與穩定的作用與發揮主要是透過單邊主義的雙邊同盟（bilateral alliances）之建立與維持，而非如同其對歐洲的安排，是採取多邊主義的集體防衛（collective defense）或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之制度設計（Ikenberry, 2004: 354-355; Cha, 2009/10: 158-163）。所謂的單邊主義，是指由華盛頓單方面地對第

二國進行政治外交、經濟、及軍事安全的作用與影響，而不透過與第三國或更多的第三國之間共同協商與討論。雙邊同盟則是指華盛頓與第二國簽訂正式的共同防衛條約，雙方關係為軍事同盟關係。如同 John Ikenberry 所言，美國霸權下單邊主義之雙邊同盟的操作實施在東北亞（日本、南韓、台灣）比在東南亞來得成功（Ikenberry, 2004: 355）。在軍事安全防衛上，美國於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之間在東北亞地區即透過與日本、南韓、台灣（中華民國）三個國家建立起堅強的雙邊安全關係（hard bilateral security ties），透過與三者的共同防衛與軍事合作之同盟關係的建立而撐起該區域的安全、穩定與和平。此三個雙邊的軍事同盟關係分別是 1951 年美國與日本訂定的「美日安全條約」（The 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以及 1960 年美國與日本簽訂的「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條約」（The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此條約乃是以前條約為基礎所立的新約）；1953 年美國與南韓簽訂「美韓共同防衛條約」（The U.S.-R.O.K. Mutual Defense Treaty）；<sup>9</sup> 以及 1954 年美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美韓與美日的同盟關係至今依然存在，但是美國與中華民國（台灣）的同盟關係則隨著華盛頓轉向承認北京而於 1979 年 1 月 1 日結束，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隨之在 1980 年 1 月 1 日失效與解除；取而代之的乃是由較為複雜的美中（北京）雙邊三項公報（1972 上海公報、1979 建交公報、1982 八一七公報）與美國單邊對台（台北）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共

---

9. 關於美韓同盟關係，參照：美國國務院網站（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a）；關於美日同盟關係，參照：美國國務院網站（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b）。

同建立起對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規範架構（Chu and Nathan, 2007-2008: 79；林文程、林正義，2006：136-137）。不論是冷戰或後冷戰時期，美國霸權與東北亞國家所共築的雙邊安全關係皆有一個共同的防禦對象—冷戰時期乃指向蘇聯及其共產集團；後冷戰時期則指向北韓與中國這兩個區域安全的潛在威脅國家。從霸權穩定論的觀點來看，美國非但是最有意願、能力、與責任扮演此一「穩定者」的角色，提供「公共財」（包括政治與外交的支持，駐軍與軍費的支出）以做為亞太區域安全之基石，同時這樣的和平穩定環境對美國及其盟邦，乃至中國、北韓與整個國際社會，都是受益者（避免受到戰事爭端的波及）。

除了創造有利於民主萌芽的區域穩定秩序外，基於霸權穩定論的精神與維持區域和平、穩定的前提（利益之所在），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所衍生的統獨爭議與國際效應更以霸權之姿採取「雙重嚇阻」（dual deterrence）與「雙重保證」（dual assurance）的平衡方式以防止北京或台北任何一方去破壞和平與穩定：一方面華盛頓要求北京不能以武力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華盛頓則拒絕接受或承認台北任何可能走向法理獨立的政治進程（Christensen, 2002: 8; Lieberthal, 2005: 54-56; Tucker, 2005: 1-15; Clark, 2006: 130-132）。前者最顯著的例子即是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由於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接選舉（象徵主權獨立之國家與民主轉型的里程碑），且當時以被北京視為台獨份子、中國分離主義者的李登輝之勝選呼聲最高，於是中國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一系列的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值此危機之時，美國政府則派遣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 CVL-22）與尼米茲號（USS Nimitz CVN-68）兩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台灣近海。爾後，美國國會更進行一系列在軍

事上有利於台灣的動作（雖然美國政府也以「三不政策」做出有利於中國的回應），包括國會提案將台灣納入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1999）與推動台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1999），同時也在政治上表示對 2000 年台灣的總統選舉，不論是誰當選，美國不會坐視中國以武力的方式干預台灣的大選（2000）（宋學文，2001：101-103）。這些發展顯示，做為「霸權」的美國在維持區域「安全穩定」的前提下會干預與反制（counterbalancing）中國對民主台灣的軍事威脅（林正義，2007）。換言之，當台灣的民主發展受到武力威脅時，華盛頓會出面保護台灣，此即為呼應了 John Ikenberry 等人所強調的新的美國自由霸權，除了考量軍事、政治及戰略之需求外，亦更廣泛且積極地納入對其盟國之民主與自由的支持。

美國這種以「民主領導者」的姿態而對台灣進行干預或影響的例子頗多，其中若只是「單純的」台灣民主運動，一般來說，美國傾向給予支持；但若台灣之民主運動涉及敏感的台灣主權或兩岸衝突，則美國的態度往往變為更謹慎，甚至保守或反對，這些例子包括 1993 年台灣開始提出的參與聯合國政策，1999 年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以及 2004 年與 2008 年民進黨政府所推動的公民投票（特別是 2008 年的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之公民投票）等。對於這些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所提出的議題，華盛頓多表示保留，甚至是公開地不支持、或是反對。<sup>10</sup> 其根本原因即在於美國擔心台灣單方面的行動（走向法理獨立）極可能改變台灣海峽的現狀，進而引起中國的武力侵犯，危及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

10. 以 2008 年的「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之公民投票」為例，華盛頓即清楚地表示反對台灣推動此一議題，參照：（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7; Christensen, 2007; Chen, 2009）。

進而迫使美國必須捲入兩岸的軍事衝突之中，而這樣的演變顯然是違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在該政策底下行之多年的美國利益（當然美國亦警告北京不可單方面地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林正義，2007）。華盛頓這樣的態度與反應正也說明了，台灣的民主政治必須是在美國霸權所規範的國際秩序當中發展、運作，台灣民主發展的結果不能挑戰、改變、與違反美國的基本國家利益，即保持區域的安全、和平、與穩定。

## 2. 美國霸權穩定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國際經濟的面向

在經濟穩定發展上，一方面如前所言，美國透過單邊主義之雙邊軍事同盟而提供東北亞區域與國家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此安穩的外部環境則相對有助於各國創造安穩的內部環境。而一個安穩的內部環境非但有助於國家內部的經濟成長、民主發芽，同時也回饋、增加國家之外的區域與全球之國際貿易、經濟互賴（Wan, 2008: 158-159），<sup>11</sup> 並且維繫、鞏固美國與盟邦所構築的區域安全秩序。如此，霸權國（美國）與接受霸權領導國（日本、南韓、與台灣）之間的軍事、政治、經濟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譬如，美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亞太地區採取類似戰後的歐洲復興計畫，透過對東北亞區域國家的個別經濟奧援（美援）而協助其經濟發展，進而達成該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與成長，以及區域軍事安全的穩定與和平。例如：從 1950 年到 1979 年的三十年之間，在經濟援助上，美國分別對日本支助了 12.32 億美元，對南韓支助了 57.22 億美元，對台灣支助了 14.64 億美元（USAID, 1950-1979a）；在軍事援助上，美國分別對日本支助了 12.40 億美元，對南韓支助了 75.19

---

11. 關於經濟相互依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的論點，可參閱 Keohane and Nye (1989)。

億美元，對台灣支助了 42.27 億美元（USAID, 1950-1979b）。美國對日本、南韓、與台灣的經濟援助非但幫助了三個國家的經濟起飛，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改善；也幫助了南韓與台灣的威權政府保持了暫時的統治正當性（稍候的經濟成長則促成了南韓與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進而削弱了兩個威權政體的統治基礎）（Adesnik and Mcfaul, 2006: 7-10）；並且也維繫、強化了美國在此區域的國家利益與領導地位。

總結來說，霸權穩定論在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面向說明了美國在東亞的存在創造了有利台灣民主發展的內外環境；而霸權穩定論在國際經濟的面向則說明了美國援助促成了台灣（與南韓）依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模式—即先經濟發展後政治民主的發展途徑（Lipset, 1959: 69-105）。兩者皆是促成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條件，而且相輔相成。但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提供台灣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安全與穩定，如此將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生根；後者則提供台灣在經濟與民生上的穩定與改善，如此將有助於民主政治的茁壯。附加說明的是，在後冷戰時期台灣與南韓都不再經歷、享有華盛頓的美援，但由美國所主導的多邊主義之「國際經濟霸權穩定」則依然發揮其影響與作用，例如美國仍有能力影響，甚至主導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作為霸權國之「代理人」（agent）以遂行美國在國際社會之領導地位。由於台灣未經歷像是南韓在 1997 年所經歷的金融危機，因此經驗上我們無從看出美國多邊主義的「國際經濟霸權穩定」對台灣有何影響。但是國際貨幣基金對 1997 年南韓的金融風暴所提供的經濟援助則說明了，美國的「國際經濟霸權穩定」仍舊對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穩定扮演了

一個關鍵的角色—如此說來，美國透過國際組織支撐的霸權穩定機制依然存在，只是作用的方式由冷戰時期的「單邊式的美國提供援助」轉換為後冷戰時期的「多邊式的國際組織提供援助」（因為多邊主義下所形成的國際組織與建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regimes 乃是霸權穩定理論與實踐的產物）。

### 三、美國自由霸權與台灣民主

#### (一) 美國自由霸權

有別於傳統霸權穩定論之大多強調霸權國與支持國之「物質」或「利益」的因素，John Ikenberry 在 1990 年代針對霸權穩定之演化現象，從一個「美國自由霸權」的面向強調民主、自由等「非物質」因素的重要性以解釋美國力量的特殊性（features of American power），以及美國如何創造一個以它為中心的國際政治、安全、與經濟秩序（Ikenberry, 1999b: 124；Ikenberry, 2003: 541；宋學文，2004：172-174）。一方面，美國自由霸權透過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與以規範為基礎的協議（rule-based agreements）對美國本身做出「戰略約束」（strategic restraints）；另一方面，由於霸權國所創造出來的國際秩序會吸引其他國家對該霸權國的跟隨，進而化解如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理論家所言，國際體系必定會出現對美國霸權進行反制衡的力量（counterbalancing reaction）。整體而言，後冷戰時期做為霸權的美國所顯現的特質有朝自由（liberal）、仁德（benevolent）的方向而演化的趨勢，其內涵包括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的價值意識與態度取向、以及在二次大戰後

對國際建制推動的承諾等等 (Ikenberry, 2001: 3, 24; Nye, 2003: 74-75)。因此,「自由」、「仁德」與「制度化」此三項是美國自由霸權的「國家人格特質」,它們促成美國服膺且實踐其所發起、建立的國際組織與建制,並且對本身的權力進行自我約束,允許受其安全與經濟保護的國家對美國進行不同意見的表達與討論,而這樣的模式亦促成受保護國願意留在由美國所建立的規則與制度當中 (Ikenberry, 1998/99: 43-78; Ikenberry, 2002: 215; Owen, 2002: 240-241)。此外,基於自由的信念、認同、與意識型態,一方面美國自由霸權也較其他類型的霸權更為推動人類社會的自由與繁榮,在國際社會上致力於推廣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 (Owen, 2002: 241); 另一方面美國自由霸權也組成自由國家之間的安全共同體 (security communities),有效降低該共同體內的安全困境問題,排除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以及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 (Risse, 2002: 261, 264-265)。<sup>12</sup>

Ikenberry 指出,美國自由霸權與歷史過往的霸權和冷戰時期的蘇聯有著許多的不同之處 (Ikenberry, 1999a: 23-28; Ikenberry, 2004: 356; 宋學文、黃子哲, 2002: 92-94) :

第一、美國自由霸權比其他霸權更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與精神,也更重視民主的決策過程。基於自由、平等、與人權等自由主義的價值,美國外交政策有其特別的傳統——向全世界推廣民主政治與自由人權。華盛頓一方面樂見、鼓勵其他國家進行民主轉型,實施民主政治 (消極

---

12. 然而 Christopher Layne 卻持與 Risse 相反的見解, Layne 認為美國霸權的自由性格與意識型態反而造成美國的過度擴張,不必要的海外軍事干預,以及介入若干應該可以避免的戰爭。自由主義對美國的巨大戰略而言並不是成就和平,反而是招致毀滅 (Layne, 2006:118-133)。

面)；另一方面則可能主動干預，甚至以發動戰爭的手段摧毀原有的威權獨裁政體而扶植、建立新的民主政體（如伊拉克與阿富汗）（積極面）。雖說對外的干預仍有可能採取軍事措施，然而該行動仍必須以廣大的美國國內民意做基礎，加以民主的體制與文化，美國自由霸權不易成爲以侵略他國爲目的的軍事霸權。

第二、以自由民主爲價值的美國自由霸權會在其對外的干預政策中尋求該政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民主、人權、與人道救助等議題則將提供美國自由霸權之干預行動更多、更廣之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基礎（例如：1996年美國對第三次台海危機之軍事干預以及 2009 年對台灣八八水災之救援行動，兩者顯示美國是基於對民主政體的保護，以及對人道救援的協助而將其介入與干預之行爲賦予正當性）。

第三、美國自由霸權所強調的是以多邊主義的原則來進行對國際或他國事務的干涉。因此美國對外的干預行動將會透過國際組織或與其盟友合作的方式來做「聯盟式」的干預，而非依循單邊主義的方式進行介入。從此一角度來看，美國對外實施干預政策時，會透過聯合國或其他的國際組織來進行，這種多邊主義方式的採行將有助於強化美國干預政策與行動的正當性、合法性，同時也讓美國自由霸權受到國際組織、國際建制與規範的監督和節制。

然而就上述美國自由霸權之「自由」、「仁德」及「制度化」三項特質以外，本文也必須強調美國自由霸權並非是完全地與純淨

地 (entirely and purely) 自由主義國家，而是兼具務實與現實主義 (pragmatic and realistic) 之國家利益考量的自由霸權 (Owen, 2006; Green and Twining, 2008; 宋學文、黃子哲, 2002)。事實上，後冷戰時期美國自由霸權所關心的議題不再單純地以政治外交或軍事安全為重，它逐漸演化成爲既重視軍事與政治外交的戰略，也強調民主自由與人權保障，重視國際經濟貿易互賴等自由主義的信念與價值 (Ikenberry, 1999a: 23-28; Layne, 2006: 118-133)。美國會在「權力平衡」、「經濟互賴」、與「自由民主」之間尋求一個既滿足美國國家利益且符合自由主義精神的「綜合安全」考量。換言之，後冷戰時期身爲自由霸權的美國是兼具著「現實主義」（強調美國國家利益）與「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重視自由民主價值）的思維以進行它在國際事務上的參與或干預；美國既是一個充滿著自由主義與理想色彩的國際政治、軍事強權，同時也是一個講求務實、以實現自我國家利益爲導向的理想主義行動者。甚至在美國的若干國際干預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思維則互爲對方的奧援—以現實主義的理由（如：基於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以及方式（如：軍事武力之行動）實踐其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訴求（建立民主政體、實踐民主政治、履行人權人道之保障、創造和平）；以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理由（民主政體、民主政治、人權人道、國際和平）給予現實主義之思維與行動（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戰爭行爲）「正當化」與「合理化」（對伊拉克與阿富汗之戰爭即爲顯著的例子）。然而，正也因爲美國自由霸權無法完全擺脫其「現實主義」的國家元素（如：基於國家之自私自利與運用戰爭武力的方式），其在海外所進行的干預行動亦多引起國際之爭論與抨擊。

## (二) 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以現實主義為前提的自由民主

從美國自由霸權的角度來說，一個走向民主政體的台灣基本上是被華盛頓所歡迎的，因為這符合美國的立國精神與國家特質——民主的制度與注重自由、平等、人權、與人道的信念。另一方面，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而言，一個「親美的民主台灣」比起一個「親美的威權台灣」是更為華盛頓所樂見的，因為這也契合美國的國家形象（image）（民主的美國理當也應該支持其他國家實踐民主政治），更重要的是它不違背，反而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親美並且不危及台海的和平穩定）。<sup>13</sup> 因此，無論是威權時代或民主化階段，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是持鼓勵與支持的態度，而這主要是來自於其內在的自由民主特質，以及符合其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然而當台灣民主發展的結果可能受到區域強權威脅時（1995-96 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機），或該民主發展可能危及區域的和平穩定時（2007-08 年的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公民投票），美國自由霸權

---

13. 就台灣的「對美國的態度」（親美 vs. 反美）與「政體的選擇」（民主 vs. 威權）兩個面向來說，本文認為華盛頓對台北的偏好與選擇之優先順序會是如下：（1）親美的民主台灣 > （2）親美的威權台灣 > （3）反美的民主台灣 > （4）反美的威權台灣。進一步來說，從美國的立場思考其對台灣的支持偏好，華盛頓將先區分台北的對美態度是「親美」或是「反美」；其次再思考台北的政體選擇是「民主」或「威權」。第一重思考是先考量華盛頓與台北的「外部關係」，當然也就事涉雙方的國家利益。華盛頓對「親美政權」的偏好會優於對「反美政權」的偏好（基於國家利益）。第二重思考則是涉及台北本身的「內部選擇」問題。在親美的政權中，華盛頓對「民主政體」的偏好會優於對「威權政體」的偏好（基於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在反美的政權裡，華盛頓對「民主政體」的偏好還是會優於對「威權政體」的偏好（基於國家形象，此時已無國家利益考量，因為基本上都是違反美國利益）。就此而言，「美國的國家利益」考量還是優於其「對民主的支持」，這也呼應先前我們所論及，華盛頓對台北若干可能違反、危及區域安全的民主化議題是不支持，甚至是反對的。

會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而務實地採取回應。前者乃以武力展現的方式針對中國對台灣之安全威脅實施軍事性之干預，後者則以政治外交的手段對台灣之民主化進行制約性之干預。兩者看似美國對台與對中之立場頗不一致，但其精神皆在穩定亞太區域安全並且鞏固美國之霸權國的領導地位，如此與「美國自由霸權」的面貌與精神並不相左。

基本上，美國對不同階段與不同議題的台灣民主化進程是呈現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者不同比重的思考。對早期台灣民主發展的支持（蔣經國時期），華盛頓基於自由主義的情懷是多過於現實主義的思維；而對中期與近期的台灣民主化之態度（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華盛頓雖然依舊懷抱著自由主義的理想，但卻反映更多現實主義的考量。首先在蔣經國時期，雖然一開始美國政府對台灣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不表示評論，但之後對蔣經國接受華盛頓郵報的專訪（蔣於專訪中表示將儘快廢止動員戡亂），民進黨成立後首次參與選舉的勝利，以及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戒嚴與報禁等等，華盛頓皆表現出期待與歡迎的態度（Chen, 2009: 141-152）（參照：表一）。美國之所以正面回應台灣的政治改革、自由化與民主化，一方面是根據它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義之意識型態與對民主政治的嚮往（自由霸權的特質）；另一方面則是此時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之進展極為有限，縱然有些許台灣獨立的聲音，卻遠不及後來發展到揚棄「一個中國」原則的地步。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華盛頓可毫無恐懼地要求威權的國民黨政府必須向反對勢力與改革開放做出妥協、讓步（Dickson, 2002: 264-286; Roy, 2003: 158-164）。

其次在李登輝執政期間，華盛頓對台灣所推動的政治民主化基本上是支持的，一方面這是延續美國自由主義的價值；二方面美國也希望台灣的民主化可以促進內部的政治穩定，同時也給予台灣外

部的亞洲國家之民主發展帶來啓發（Diamond, 2002; Bush, 2005: 70-92）；三方面這也符合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佈局—即透過「民主擴大」（democratic enlargement）或「民主拓展」（democratic promotion）而達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Muravchik, 1991; Diamond, 1992: 25-46; Talbott, 1996: 47-63），這些可謂都是美國自由霸權特質的展現。然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開展，一個台北與華盛頓（包括北京）都無可避免的問題也順勢產生，即台灣方面以李登輝總統為代表的本土政權開始嘗試拋棄原先國民黨政府所固守的「一個中國」原則，並尋求以民意支持為基礎（民主原則），具備「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精神的政策，其具體行動包括：參與聯合國政策的提出（1993），台灣舉行首屆之民選總統（1996），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政策的提出（1997），以及特殊兩國論的提出（1999）等等。由於這些議題或直接或間接地衝擊「一個中國」原則與架構，並且極可能危及台灣海峽的安全、和平與穩定（李登輝訪美後的 1995-96 年台海危機即為一例），因此華盛頓對這些議題的態度則是非常「現實主義地」（realistically）表示反對或不支持（參照：表一）。<sup>14</sup>

---

14. 美國並沒有不支持或反對 1996 年台灣第一次舉行的總統直接選舉，但由於該次選舉是在中國對台灣近海實施一系列的軍事演習之下所進行，基於區域安全與穩定的考量（現實主義因素），美國則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巡航」台灣近海以防止海峽雙方走向軍事衝突或戰爭（以武力手段）。參照：第一節。

表一 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主要民主化議題的態度反應

台灣主要的民主化議題	美國的態度			
	支持	不表評論	不支持， 但接受	不支持 /反對
● 蔣經國時期 (1986-1988)				
民進黨成立(1986)		✓		
解除戒嚴(1987)	✓			
開放黨禁(1988)	✓			
● 李登輝時期-----				
(1988-2000)				
召開國事會議(1990)	✓			
宣告內戰終止(1991)	✓			
國民大會全面改選 (1991)	✓			
憲政改革 (1991--1997)	✓			
開放黑名單人士返台 (1992)	✓			
廢除刑法第一百條 (1992)	✓			
立法院全面改選 (1992)	✓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與警備總 部(1992)	✓			
提出參與聯合國政策 (1993)				✓

李登輝訪美 (1995)	✓	
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 (1996)	✓	
提出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1997)		✓
提出特殊兩國論 (1999)		✓
● 陳水扁時期-----		
(2000-2008)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2002)		✓
護照封面加註台灣 (2003)	✓	
公民投票法入憲與立法 (2003)	✓	
提出制訂台灣新憲法 (2003)		✓
第一次全國公民投票 (2004)	✓	
政府機構與國營事業正名 (2004-2007)	✓ (內部)	✓ (外部)
終止國家統一綱領與國家統一委員會之運作 (2006)		✓
第二次全國公民投票 (入聯公投) (2007--2008)		✓

---

資料來源：(Chen, 2009: 103-119)

在陳水扁執政時期，由於陳所屬的民主進步黨為一形成於台灣本土，講求台灣主體意識，以追求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政黨，因此其所推動的許多民主化議題皆在實踐「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理想（民進黨認為這些議題也是符合絕大多數台灣的民意）。然而其中許多議題不只在國內存有爭議，在國外也深刻地衝擊美—中—台三角關係，引來華盛頓與北京擔憂台灣真正地想邁向「法理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這些議題包括：「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論點的提出（2002），護照封面加註台灣（2003），公民投票法入憲與立法（2003），提出制訂台灣新憲法（2003），對政府機構與國營事業正名（2004-2007），第一次全國公民投票舉行（2004），終止國家統一綱領與國家統一委員會之運作（2006），第二次全國公民投票舉行（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公投）（2007-2008）等等。一如李登輝時期的情形，雖然華盛頓仍支持台灣進行民主深化與民主鞏固（*democratic deepening and consolidation*），但是對上述議題則非常現實主義地不予支持，甚至是反對（參照：表一）。美國如此的態度一方面顯現其「自由霸權者」對自由、民主信念的推崇，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展現它「霸權穩定者」對維持既有秩序的堅持；而且當兩者相互抵觸、衝突的時候（「自由霸權者」vs.「霸權穩定者」），華盛頓會選擇做為一個「霸權穩定者」。從自由霸權與霸權穩定論的角度看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作用與影響，本文歸結：「穩定」優於「自由」；「自由民主」必須是在「穩定和平」的基礎之上、條件之下、與範圍之內發展、進行。準此，美國在冷戰時期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確實發揮了正面的助益，同時它也是「霸權穩定理論」的實踐與展現，即由霸權國家所提供穩定的國內與國外環境以及經濟發展確實

是台灣走向政治民主的重要前提與條件（如此也呼應現代化理論的觀點）。但本文也必須指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基於它的「自由霸權」很「弔詭地」（paradoxically）一方面對台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具有某種程度之正面的保護功能（即避免受到中國武力的侵犯，例如 1996 年的台海危機），維繫此一新興民主政體的延續與發展；另一方面對台灣透過民主深化、鞏固而邁向一個健全與完整的民主政體則起了若干負面的壓抑作用，因為失去華盛頓支持或背書（甚至是出自於華盛頓的反對）的民主化進程（例如事涉台灣主權與國際代表權的公民投票），非但許多爭議（例如統獨、兩岸經濟整合、政治協商與軍事互信機制之建立等）不易在台灣內部透過完整的民主、和平方式（如公民投票）以形成共識並尋求解決，同時它對深化與鞏固台灣民主化的成果，做為一個充分與完全自由意志展現的民主政體，以及讓台灣欲藉由民主力量的發聲以達改善其國際地位並且保障其國家安全的努力與嚮往功虧一簣。

#### 四、美國自由霸權的干預與台灣民主

由於美國是第二次大戰之後的強權國家，也是冷戰結束之後的唯一超級強權，一方面其國家利益廣佈在世界各地，二方面美國也以肩負國際秩序的和平穩定，推動民主人權之普世價值為己任（前者為霸權穩定論之實踐，後者為自由霸權的特質），因此不論是在冷戰階段或後冷戰時期，華盛頓對他國在人道人權與自由民主之議題上的涉入與干預處處可見。究竟美國自由霸權這一系列對外的干預行為給我們在台灣民主的發展上有何思考與啟發？本節就干預的方式（多邊主義 vs. 單邊主義，軍事入侵 vs. 非軍事入侵）探討美國

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關於干預的性質，也就是干預是基於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請參照上述兩節）。

## （一）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1)：美國單邊主義的進行

爾近國際社會與美國國內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除了爭執華盛頓之介入與干預他國事務乃是基於人道人權或自由民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之外，另一個主要的爭辯就是華盛頓應該採取「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或「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方式進行干預。<sup>15</sup> 歷史經驗顯示，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人道干預經常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相結合（如對波士尼亞、東帝汶、與科索沃等），華盛頓乃是透過多邊的國際組織（主要是聯合國）之參與、協商而發展出由美國進行「實質領導」（substantial leadership），而聯合國採行「名目領導」（nominal leadership）的多邊主義干預模式（宋學文、黃子哲，2002：89）。<sup>16</sup> 但是在對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上，美國則是在尋求多邊國際組織與其他多數國家的支持失敗後，採取單邊行動的方式以進行其反恐戰爭與民主擴展。這兩相對照之下呈現了一個弔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欲藉由多邊主義的採行以實現國際秩序穩定的理想，卻在某些特例上造成華盛頓採取單邊主義的方式

---

15. 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在海外推廣民主政治的辯論文獻，請參照：Doyle (2000)；Hendrickson and Tucker (2005)；Owen (2006)；Fukuyama and McFaul (2007-2008)。關於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的爭辯文獻，請參照：Hass (1997)；Tucker (1999)；Patrick (2002)；Jentleson (2003-2004)。

16. 多邊主義基本上有三大特色如下：一為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二為非歧視性或普遍性之行為原則（nondiscrimination or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以及三為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關於多邊主義的介紹，請參照：Ruggie (1992)。

來實踐（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如此基於「多邊主義的理想」卻造成「單邊主義的結果」十分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所遭遇的情形——即華盛頓努力創造一個由集體安全體制（國際聯盟）所支撐的國際秩序，最後美國自己卻抽離、放棄該國際組織的建立；積極走入「多邊參與的國際主義」卻演變成消極退回「單邊保守的孤立主義」。就此而言，美國在一開始採取多邊主義策略的時候似乎也就埋下它未來極可能採取單邊行動的結果。<sup>17</sup> 顯然許多支持多邊主義的理論家與政策規劃者當初並未注意到，美國原先想藉由多邊的國際建制對自己與其他國家做出戰略約束以限制各方力量的擴張，卻造成美國成爲該約束底下的最大「受害者」（因爲美國被該國際建制所「綁手綁腳」），最後迫使華盛頓必須選擇揚棄該建制與約束而「千山萬水我獨行」。雖然如此，本文還是必須指出從 2001 年迄今的反恐戰爭與民主擴展之進行並非表示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介入已棄多邊主義而就單邊主義（Ikenberry, 2003: 533-550; Tharoor, 2003: 67-80）；美國只是在某些案例與某段時間上採取單邊主義的方式進行，而在後來的行動中仍繼續尋求多邊的合作與支持（U.S. The White House, 2008）。<sup>18</sup> 最近的一個例子即爲美國主張用多邊主義的方式針對亞太地區之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問題進行解決（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而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影響的方式（關於美國會是採取多邊主

---

17. Owen 即認爲越多、越積極的人道人權干預與海外的民主政體建立，其實也就代表越強大的美國國力與影響力，而這也表示會有越多、越積極的美國單邊行動（Owen, 2006: 36）。

18. 小布希總統於卸任前夕即表示美國將繼續致力於堅強的多邊合作以面對日益繁雜的國際事務問題。參閱美國白宮網站（U.S. The White House, 2008）。歐巴馬總統於 2010 年 5 月 27 日所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中亦強調，華盛頓在全球力量的持續將透過尋求國際合作的方式予以實現（Obama, 2010: 40-50）。

義或是單邊主義的爭論)主要是以華盛頓單邊行動為主,而非採取多邊模式進行。相較於對波士尼亞、東帝汶與科索沃的干預之採取多邊主義的方式(透過聯合國),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只有單方面的行動,而未尋求其他第三國的配合或合作,也未透過聯合國的決議以對台灣的民主化進行介入與干涉。本文認為此現象的產生有一個結構因素與一個歷史因素。首先,結構因素乃是源自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對亞洲與對歐洲所採行的安全架構之不同所致。由於華盛頓對東亞的安全秩序是透過單邊主義的雙邊同盟之建立以維持,而非如同其對歐洲的安排是採取多邊主義的集體安全設計(Ikenberry, 2004: 354-355; Cha, 2009/2010: 158-163)(參照第二節,(二)之1),因此美國對台灣民主化進程與議題所引發的國際效應主要是順著單邊的方式進行干涉。試想如果在東亞有一個類似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西太平洋公約組織」(West Pacific Treaty Organization, WPTO)存在,而台灣也在該組織當中,則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可能遭遇或引發的潛在危機極有可能必須以多邊主義的方式進行干預(包括是否將台灣排除在該集體安全體制之外的問題亦然),因為台灣是此一國際多邊組織中的一員,美國極可能必須參考或顧慮該組織之其他成員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與反應。其次,歷史因素係指台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而其代表權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由於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被北京所取代,加以中國極力將台灣問題予以「內政化」並且拒絕聯合國或國際社會的介入,因此不論是美國、其他第三國(台灣的友邦或非友邦)、以及聯合國本身,都難以透過聯合國的多邊方式對台灣民主發展進行關切或干預。

## (二) 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2)：政治外交為主，必要時以軍事手段

在美國對他國人道人權或自由民主的干預行動中，華盛頓對非民主之威權國家的干預方式與對民主國家的干預方式有極大差異，而此一差異基本上也呼應了民主和平理論所揭櫫的國際政治原則——即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很少會以戰爭的方式解決歧見；但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卻很有可能會以武力、戰爭的方式解決衝突。換言之，美國對外干預方式的差別正是因為所欲干涉對象的政體型態（regime type）不同所致。華盛頓對民主國家內部的主流民意展現以及民主政治運作很難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以經濟制裁，甚至軍事入侵的方式來進行干預，而至多只能採取政治外交的手段要求或施壓民主國家的政府採取某項作為或不作為。相對地，華盛頓對非民主國家之威權政府的反民主行徑與對人權、人道的迫害則有正當性的理由（基於自由民主與人道人權的普世價值）透過各種手段的運用，甚至是以戰爭、軍事入侵與佔領的方式（另一種形式的正義之戰），迫使威權政府在若干議題上做出妥協與讓步，進而實行自由化與民主化，做到人權保障與人道主義的落實（Muravchik, 1991: 91-118; Adesnik and Mcfaul, 2006: 7）。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影響的干預方式（軍事入侵 vs. 非軍事入侵）是以非軍事手段的政治與外交施壓為主，華盛頓並沒有採取經濟制裁的干預，亦無對台發動軍事入侵或戰爭。而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也沒有伴隨聯合國的介入（不論是任

何聯合國的決議，或者是聯合國部隊的維和行動）。<sup>19</sup> 我們認為美國對台灣民主的干預之所以沒有採取經濟制裁或軍事入侵的方式有下列三個理由：第一、由於經濟制裁可能造成經濟的衰退與蕭條，引發政治與社會的動盪失序，如此也將衝擊新誕生的民主政治，同時也給予北京一個武力犯台的藉口（中國認為當台灣內部發生動亂時，其將對台動武），這顯然違反霸權穩定論所強調的前提—安全與穩定。就此，華盛頓並無理由以經濟制裁的方式干預台灣民主發展。第二、根據民主和平理論，因為民主國家之間鮮少會以戰爭的方式解決紛爭，因此民主的美國與民主的台灣（不論是民主轉型之中，或已是民主鞏固）會兵戎相見基本上可能性不高。一方面華盛頓沒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以武力方式入侵台灣，尤其是針對台灣主流民意與民主政治發動軍事攻擊；二方面台灣在政治外交與軍事安全上是極度地依賴美國，且雙方存在著「準」或「非正式」的軍事同盟關係，這都讓華盛頓沒有正當理由採取軍事干預的方式來處理台灣內部的民主進展與政治議題。第三、以軍事武力方式干預台灣內政，不論是入侵台灣或封鎖台灣周邊，這都強烈宣示美國（美軍）對台灣主權的干涉與侵犯，如此極有可能引發中國強烈反彈與抗議（中國亦認為當外國勢力入侵台灣時，其將對台動武）。基於以上理由，美國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干預並未採取經濟制裁或軍事入侵的方式進行，而是以政治、外交方法做出影響與干預。

雖然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主要是以政治、外交的方式進

---

19. 雖說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主要是以政治與外交途徑進行，但在該影響裡確有一極大的弔詭之處，即美國對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府乃是採取「加油加速式」地施壓、催促以迫使其實施政治改革、自由化、與開放政治參與；對民主化階段的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則以「放開油門式」地不支持或「踩煞車式」地反對兩者推動若干具有主權與統獨爭議，以及可能引發台海危機的民主化議題。

行，但是當台灣此一新興民主政體遭遇外來軍事武力威脅的時候，美國會基於維持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霸權穩定論），也基於保護新興的民主政體而採取軍事手段進行干預，最顯著的例子即是 1996 年的台海危機（參照第二節，（二）之 1）。雖說該危機與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有關（北京認為具台獨色彩的李登輝之當選機會很大，如此將加速台灣走向獨立、尋求國際承認）（Zhao, 1999: 1-18），但台灣在此次選舉過程裡以及結束後並無宣布獨立，或更改國號，亦無進行統一或獨立之公民投票，或加入聯合國之公民投票等「台獨議題」，而中國則以軍事演習的方式企圖影響台灣民主政治的進行，迫使台灣不往獨立的方向前進，甚至伺機改變台灣海峽的現狀，如此引來美國嚴重的關切，於是柯林頓政府派遣獨立號與尼米茲號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台灣近海以穩定台海的緊張局勢（Zhao, 1999；宋學文，2001）。此一發展演變即說明，在台灣沒有做出挑釁、刺激北京的舉動下而中國卻以武力進行威脅，甚至是侵犯台灣時，華盛頓會以軍事的手段提供台灣在安全防衛上的協助（林正義，2007）。本文認為美國採取軍事手段對台灣民主所受之威脅的介入、干預與控管具有雙重的意義：其一是對台灣安全的具體承諾，而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也是對台灣海峽與東亞的安全穩定之承諾，此乃為霸權穩定論的原則與實踐；其二是對台灣民主的肯定與支持，而對台灣民主成就的肯定與支持正呼應美國重視民主與自由等普世價值，此乃為美國自由霸權的精神與實踐。<sup>20</sup> 就某種層面來說，台灣的安全是延伸自台灣的自由與民主成就；台灣的

---

20.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即表示，對台軍售既是美國法律（台灣關係法）的要求，也是美國對台灣的承諾；「美國很重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對美國而言，台灣是一個閃耀的民主典範（shining mode of democracy），美國不會棄兩千三百萬的人民不顧」（自由時報，2010）。

自由與民主果實則是受惠於台灣的安全鞏固。而台灣安全與台灣民主之間的關連性則是巧妙地由美國所主導的霸權穩定，美國的自由霸權特質，以及美國對人道人權與自由民主的干預行為三者所串連起來。

## 五、結 論

本文最主要是以「霸權穩定論」之演化做為研究途徑，依循政治與安全的霸權穩定論，經濟的霸權穩定論，美國自由霸權的內在特質，以及美國在實踐其巨型戰略（維持亞太的和平穩定）時對台灣所做出的干預行為，提出一個結合霸權穩定論與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影響的觀察與分析。我們認為必須透過對「美國自由霸權」的瞭解才能更適切地解釋美國在台灣民主發展上的角色。而我們也必須強調美國自由霸權觀是從傳統的霸權穩定論演化而來，其中最大的差別乃是相較於傳統的霸權穩定論，美國自由霸權除了注重物質的因素外（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等國家力量），亦強調非物質層面的因素（自由民主與人道人權的精神），以及 Joseph Nye Jr. 等人所強調之「軟實力」（soft power）。<sup>21</sup> 另外在國際事務的處理方式上，美國自由霸權除了既有的雙邊制度之外，更強調多邊主義的機制與運作。

沿著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途徑探討美國在台灣民主發展上的角色，我們發現台灣的民主發展是深受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環境與強權政治所影響。而此一國際環境的秩序與邏輯最主要是先建立在「傳統霸權穩定論」的思維之上，即基於維持區域的「安全、和平、穩

---

21. 有關「軟實力」（soft power）的文獻請參閱 Nye (2003)；Nye (2004)。

定」之前提與目標，華盛頓認為一個霸權國（美國）在該區域的存在是必要也是關鍵，此霸權國不只提供政治外交與軍事安全方面的和平與穩定，同時也提供國際經濟與國家民生方面的穩定與繁榮。因為霸權的存在與目標乃在於創造、維繫、穩固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因此霸權會極力排除任何危害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因素。又因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演化為一個重視且在海外推廣民主自由與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所謂「美國自由霸權」，於是台灣的民主政治遂在美國的歡迎與鼓勵下大步成長。但卻也因為台灣民主化所衍生出的國家認同分歧，主權與統獨爭議，以及這些議題再衍生所對台海和平穩定可能形成的負面衝擊，因此美國基於「霸權」的角色與「穩定」的前提遂對海峽兩岸雙方進行某種程度地介入、干預與控管，即一方面華盛頓要求北京不能以武力的方式解決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華盛頓則拒絕接受或承認台北任何可能走向法理台獨的政治進程。但基本上華盛頓則是鼓勵北京與台北雙方進行接觸與擴大交流。這一系列美國對台灣民主的作用與影響其實都是在華盛頓的「霸權穩定」與「自由霸權」脈絡下所進行，這也是本文之所以認為「霸權穩定論」的演化途徑是理解美國影響台灣民主政治與國家安全的一個嶄新之分析觀點。

此外也就在美國霸權角色進行演化的脈絡底下，台灣的自由民主與其國家安全問題則產生微妙的一種連結。本文認為在台灣沒有進行任何「法理獨立」的前提下（包括宣佈獨立、廢除現行憲法與制訂新憲法、進行統獨公民投票、以及進行加入以國家身份為必要條件之國際組織的公民投票等），而中國卻採取軍事威脅或武力侵犯的方式危及台灣安全時，美國會以軍事的手段提供台灣在安全防衛上的協助，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機即為歷史經驗上的顯著例子（林正義，2007）。其中美國以軍事手段干預台灣安全的選項可包

括：保持或增加對台軍售（根據台灣關係法），擴大美台之間軍事交流，派遣航空母艦「巡弋」台灣近海（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模式），派兵間接參與戰爭（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模式），或派兵直接參與戰爭等。除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與「權力平衡」觀點可做為解釋美國對台灣安全的軍事干預外，我們認為現今台灣所擁有的「民主政治」、「民主政體」與「人道人權」等自由主義之價值與信念也是美國關照台灣安全與台灣問題的重要思考依據，並且做為它介入、干預台灣安全問題的重要理由。於是乎，沿著「霸權穩定論」和「美國自由霸權」的精神與實踐，華盛頓將本於後冷戰時期對國際秩序之和平穩定的重視，以及對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強調而對民主的台灣進行「保護式的干預」（protective intervention），即干預的目的乃在於「保護台灣」（也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干預與前述之「雙重嚇阻」策略相互吻合，即一方面防止中國以武力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則防範台灣以「法理獨立」之訴求與行動而挑釁、刺激中國，兩者的目標皆在維持台灣海峽與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同時也對台灣安全提供保護與保障。也因為如此，台灣安全與台灣民主遂發展成爲一種「共生的」（coexistent）與「共棲的」（symbiotic）關係—即台灣安全乃是從它在自由民主上的成就延伸而來，台灣自由民主的持續與鞏固則是受惠於台灣安全的保障，而兩者之間的連結乃是透過美國所主導的霸權穩定，美國的自由霸權特質，以及美國對人道人權與自由民主所做的干預三者所架構起來。就此而言，「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研究途徑確實也是提供我們理解台灣安全與台灣民主之關連性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

## 參考書目

- Adesnik, Ariel David and Michael Mcfaul. 2006. "Engaging Autocratic Allies to Promote Democra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2: 7-26.
- Armitage, Richard L. and Joseph S. Nye. 2007.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Brinkley, Douglas. 1997. "Democratic Enlargement: The Clinton Doctrine." *Foreign Policy* 106 (Spring): 111-127.
- Burnell, Peter. 2005.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External Support for Democratiza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 3: 361-384.
- Bush, Richard. 2005. "Lee Teng-hui and 'Separatism'."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70-9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a, Victor D. 2009/2010.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 3 (Winter): 158-196.
- Chen, Liang-Chih Evans. 2009. "Say Democracy, Do Realistically: Interplays betwee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86-2008."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2.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 4 (Autumn): 7-21.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7. "Speech to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2007)." in [http://www.us-taiwan.org/reports/2007\\_sept11\\_thomas\\_christensen\\_speech.pdf](http://www.us-taiwan.org/reports/2007_sept11_thomas_christensen_speech.pdf).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11.
- Chu, Yun-han and Andrew J. Nathan. 2007-2008.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for Chang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1, 1 (Winter): 77-91.
- Chu, Yun-han. 2003. "East Asia: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Atul Kohli et al. eds. *States, Markets, and Just Growth: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27-163. Tokyo an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Cal. 2006. "The U.S. Balancing Rol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Irony of Muddling Through." *Issues and Studies* 42, 3: 129-163.
- Cox, Michael et al. 2000.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1992. "Promoting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87 (Summer): 25-46.
- Diamond, Larry. 2002. "Stabilizing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A Strategy for Taiwan's Dignity and Security." Remarks to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Sartoga, Californi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 Dickson, Bruce. 2002. "Taiwan's Challenge to U.S. Foreign Policy."

- in Bruce Dickson and Chien-Min Chao. eds. *Assessing the Lee Teng-hui Legacy in Taiwan's Politic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 264-286. New York: M. E. Sharpe.
- Doyle, Michael W. 2000. "Peace, Liberty and Democracy: Realists and Liberals Contest a Legacy." in Michael Cox et al.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21-40.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and Michael McFaul. 2007-2008. "Should Democracy Be Promoted or Demo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1, 1 (Winter): 23-45.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2000.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een, Michael J. and Daniel Twining. 2008. "Democracy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Asia: The Realist Principles Behind an Enduring Ide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 1: 1-28.
- Haggard, Stephen and Beth A. Simmons. 1987.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3: 491-517.
- Hass, Richard N. 1997. *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Hendrickson, David C. and Robert W. Tucker. 2005. "The Freedom Crusade." *The National Interest* 81: 12-21.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1998/1999.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3 (Winter): 43-78.
- Ikenberry, G. John. 1999a. "America's Liberal Hegemony." *Current History* 98, 624: 23-28.
- Ikenberry, G. John. 1999b. "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 T.V. Paul and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123-1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2002.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213-23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2003. "Is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in Declin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 3: 533-550.
- Ikenberry, G. John. 2004.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8, 3: 353-367.
- Jentleson, Bruce W. 2003-2004. "Tough Love Multilateralism." *The*

- Washington Quarterly* 27, 1 (Winter): 7-24.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Kindleberger, Charles Poor.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oor.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2: 242-254.
- Krasner, Stephen D. 1976.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5, 2: 317-347.
- Layne, Christopher. 2006.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05. "International Linkage and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3: 20-34.
- Lieberthal, Kenneth. 2005.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Affairs* 84, 2: 53-63.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 69-105.
- Merry, Robert W. 1999. "Bill Clinton and the Triumph of Wilsonism."

-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3, 4: 20-27.
- Monten, Jonathan. 2005. "The Roots of the Bush Doctrine: Pow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4: 112-156.
- Muravchik, Joshua. 1991. *Exporting Democracy: 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 Nye, Joseph S. Jr.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ye, Joseph S. Jr. 2003. "The Velvet Hegemon: How Soft Power Can Help Defeat Terrorism." *Foreign Policy* 136: 74-75.
- Nye, Joseph S.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Obama, Barack.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Press.
- Owen, John M. IV. 2002.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Primacy; or Benigni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239-25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wen, John M. IV. 2006. "Democracy, Realistica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 83: 35-42.
- Patrick, Stewart. 2002. "Multilat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Ca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Ambivalence."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1-44.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eceny, Mark. 1999. *Democracy at the Point of Bayonet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evehouse, Jon C. 2002. "Democracy from the Outside-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3: 515-549.

Rigger, Shelley. 2005.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16-43.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isse, Thomas. 2002.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260-28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stow, Walt. 198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65-198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oy, Denny. 2003.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uggie, John Gerard. 1992.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3: 561-598.

Schweller, Randall L. 2000. "U.S. Democracy Promotion: Realist Reflections." in Michael Cox et al.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41-62.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Tony. 1994.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lbott, Strobe. 1996.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5, 6: 47-63.

Tharoor, Shashi. 2003. "Why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United Nations." *Foreign Affairs* 82, 5: 67-80.

Tucker, Nancy Bernkopf. 2005. "Dangerous Strait: Introduction."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1-1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ucker, Robert W. 1999. "Alone or With Others: The Temptation of Post-Cold War Power." *Foreign Affairs* 78, 6: 15-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7. "Daily Press Briefing." in <http://2001-2009.state.gov/r/pa/prs/dpb/2007/jun/86611.htm>.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Travel Diary: Secretary Clinton Participates in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http://blogs.state.gov/index.php/site/entry/travel\\_diary\\_secretary\\_asean\\_regional\\_forum](http://blogs.state.gov/index.php/site/entry/travel_diary_secretary_asean_regional_forum). Latest update 20 September 20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a. "U.S.-Korean Relations." in <http://www.state.gov/r/pa/ei/bgn/2800.htm#relations>. Latest update 15 August 20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b. "U.S.-Japan Relations." in <http://www.state.gov/r/pa/ei/bgn/4142.htm#relations>. Latest update 15 August 2011.

- U.S. The White House. 2008. "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8/09/20080923-5.html>. Latest update 17 October 2011.
- USAID. 1950-1979a. "U.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custom country report (historical dollars)." in [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query/do?\\_program=/eads/gbk/countryReport&unit=N](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query/do?_program=/eads/gbk/countryReport&unit=N). 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1.
- USAID. 1950-1979b. "U.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custom country report (historical dollars)." in [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query/do?\\_program=/eads/gbk/countryReport&unit=N](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query/do?_program=/eads/gbk/countryReport&unit=N). Latest update 19 September 2011.
- Wan, Ming.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Striving for Wealth and Power*.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Wang, Vincent Wei-Cheng. 2003. "U.S. Policy Toward Strategic Asia Since September 11: Expanding Power or Promoting Values?" *Issues and Studies* 39, 4: 169-181.
- Zhao, Suisheng. 1999. "Introduction: Making Sense of the 1995-96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Suisheng Zhao. 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1-18. New York: Routledge.
- 自由時報。2010。〈司徒文：美不會棄台灣 2300 萬人不顧〉。  
《自由時報》2010/07/11：A4。(The Liberty Times. 2010. "William A. Stanton: The U.S. Will Not Abandon 23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The Liberty Times* 11 July 2010, late ed.: A4.)

- 吳玉山。2002。〈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布希主義〉。《政治科學論叢》17：1-31。(Wu, Yu-Shan. 2002. "Still the Realist Tradition: September 11 and the Bush Doctrin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7: 1-31.)
- 宋學文。2001。〈二十一世紀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持續與轉變：美國對台安全策略之形成、鬆動與轉變〉。《戰略與國際研究》3，3：82-115。(Soong, Hseik-Wen. 2001.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US-PRC-ROC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3: 82-115.)
- 宋學文。200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43，2：171-196。(Soong, Hseik-Wen. 2004. "Level-of-Analysis and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sues and Studies* 43, 2: 171-196.)
- 宋學文、黃子哲。2002。〈從東帝汶獨立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一個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問題與研究》41，3：83-108。(Soong, Hseik-Wen and Tzu-Che Huang. 2002. "The Independence Campaign of East Timor, America's Interventionism, and Hegemonic Stability." *Issues and Studies* 41, 3: 83-108.)
- 林文程、林正義。2006。〈台灣修憲與台美中三角關係〉。《台灣民主季刊》3，4：125-164。(Lin, Wen-Cheng and Cheng-Yi Lin. 2006. "Taiwan'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aipei-Washington-Beijing Relationship."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3, 4: 125-164.)

- 林正義。2007。〈「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美國預防台海危機的政策辯論〉。《遠景基金會季刊》8，1：1-50。(Lin, Cheng-Yi. 2007. “Strategic Ambiguity, Strategic Clarity, or Dual Clarity: U.S. Policy Debates over the Prevention of a Taiwan Strait Crisis.” *Prospect Quarterly* 8, 1: 1-50.)
- 陳欣之。2006。〈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問題與研究》45，2：111-140。(Chen, Hsin-Chih. 2006. “The Birth, Per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polar System.” *Issues and Studies* 45, 2: 111-140.)

# **U.S. Influence on Taiwa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eik-wen Soong\*    Liang-chih Evans Chen\*\*

As we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outside factor i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at is the U.S. influence on the islan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Does it promote democracy in Taiwan conditionally or unconditionall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s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s changed its focus from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matters to an emphasis on both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factors, such as democracy, freedom, equity,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onsidering this transformation, this research paper examines the U.S. role in Taiwa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rom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followed by addressing traditional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features of American liberal

---

\* Professor and chair, 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hegemony, and its humanitarian and democratic intervention abroad. Basically, we argue that the U.S. is sympathetic and supportive of Taiwan's democracy.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however, because of China's rise,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has become the core consideration of America's Taiwan policy. The concern is based on both 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ests and its support for liberal democracy. This development demonstrates why recently the scholarly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ears to probe U.S. foreign inter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liberal hegemony" instead of the viewpoint of traditional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only, and it also echoes our evolutionary approac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 this study.

**Keywords:** Taiwan's democracy, Taiwan's security,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evolution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merican liberal hegemony, intervention.